

台灣獨立運動的典範---黃昭堂

張炎憲

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秘書長、台灣社社長
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、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兼任教授



現任：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秘書長、台灣社社長
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
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兼任教授

學歷：日本東京大學歷史學博士

經歷：◆ 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、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兼任教授
◆ 中央研究院社科所研究員
◆ 台灣歷史學會會長
◆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秘書長/董事
◆ 國史館館長
◆ 台灣教授協會會長
◆ 台灣社社長

代表著作：張炎憲、陳世宏訪主編，《台灣主權與認同外交》，台北：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，2012。
張炎憲、陳美蓉主編，《許世楷與台灣認同外交》，台北：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，2012。
張炎憲、陳美蓉主編，《羅福全與台日外交》，台北：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，2012。
張炎憲、陳美蓉主編，《建國舵手黃昭堂》，台北：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，2012。
張炎憲、陳世宏主編，《蔡明憲與捍衛國防》，台北：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，2011。
張炎憲、陳世宏主編，《吳釗燮與外交突圍》，台北：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，2011。
張炎憲、曾秋美、沈亮採訪記錄，《青春·逐夢·台灣國系列 2：掖種》，台北：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，2010。



- 張炎憲、曾秋美、沈亮採訪記錄，《青春·逐夢·台灣國系列 3：發芽》，台北：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，2010。
- 張炎憲、曾秋美採訪，《花蓮鳳林二二八》，台北：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，2010。
- 張炎憲、陳美蓉編著，《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》，台北：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，2010。
- 張炎憲、曾秋美採訪記錄，《青春·逐夢·建國系列 1：一門留美國學生的建國故事》，台北：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，2009。
- 張炎憲、許瑞浩、訪問記錄，《從左到右六十年：曾永賢先生訪談錄》，台北：國史館，2009。
- 張炎憲、陳鳳華訪問記錄，《100 行動聯盟與言論自由》，台北：國史館，2008。
- 張炎憲等主編，《李登輝總統訪談錄》全四冊，台北：國史館，2008。
- 張炎憲、陳美蓉、尤美琪訪問記錄，《台灣自救宣言－謝聰敏先生訪談錄》，台北：國史館，2008。
- 張炎憲等，《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》，台北：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，2006。
- 張炎憲、許明薰、楊雅慧、陳鳳華訪問記錄，《風中的哭泣：五〇年代新竹政治案件》，新竹：新竹市文化局，2002。
- 張炎憲、許明薰、楊雅慧、陳鳳華訪問記錄，《新竹風城二二八》，新竹：新竹市文化局，2002。
- 張炎憲、胡慧玲、曾秋美訪問記錄，《台灣獨立運動的先聲：台灣共和國》（上冊）（下冊），台北：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，2000。
- 張炎憲、陳鳳華訪問記錄，《寒村的哭泣：鹿窟事件》，台北：台北縣政府文化局，2000。



張炎憲、陳美蓉、楊雅慧編，《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》，台北：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，1998。

張炎憲、高淑媛訪問記錄，《鹿窟事件調查報告》，台北：台北縣立文化中心，1998。

張炎憲、陳美蓉、黎中光編，《台灣近百年史論文集》，台北：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，1996。

授課大綱：一、變動年代的台灣

二、台灣獨立運動的開拓者

三、台灣獨立運動的守護者

四、台灣民族主義的論述者

五、內外折衝的人格者

六、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典範

講 義：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典範——黃昭堂

一、變動年代的台灣青年

黃昭堂，出生於 1932 年，是在日本統治的年代。家住台南州北門郡七股庄下山仔藔，是瀕海的漁村。父親從事魚塭的工作，他從小在鄉村長大，養成素樸、耐苦、勤勞的個性。在日本時代，進入公學校就讀，奠下日文基礎。戰爭時期體驗到美軍轟炸台灣、走空襲的驚惶，日本戰敗後體認到台灣人到底是戰勝還是戰敗的矛盾，並親眼見到日本人一夜之間淪為戰敗國的淒涼。這些親身經驗影響了他日後思想的形成。

戰後，1946 年 2 月考入台南一中。在學中發生二二八大屠殺，有軍警來到家裡欲抓走父親，但因父親不在，黃昭堂成為代罪羔羊，受到粗暴盤問，最後父親送出紅包，才獲得解決。二二八成為他生命中深刻的印記。



就讀台南一中六年期間，學校訓導處灌輸反攻大陸的思想，老師要求黃昭堂加入國民黨，並要學生下課後，到市街上向市民宣傳反攻大陸、解救同胞的政策。但他始終沒有加入國民黨。這六年期間，他感受到台灣人、日本人與中國人的文化差異性，開始思索台灣人的成分到底是什麼。加上父親的早逝，讓他的內心沉潛，進入小提琴音樂的世界。

就讀台灣大學經濟系三年級時，適逢省議員改選，黃昭堂將佳里的房子借給無黨無派的郭秋煌當作競選總部，並返鄉助選，這是他首次參與選舉，表達他對台灣政治的熱情，以及反對國民黨、支持無黨無派的態度。

在大學時，黃昭堂認識了歷史系的吳新雄。吳新雄常對他提起「台灣前途是要獨立？還是要託管？」所以他早就知道廖文毅在日本從事台灣獨立運動，也知道聯合國託管論的問題。大四時（1956 年），廖文毅在日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，吳新雄曾將此消息與他討論，因此促使他想去日本與廖文毅接觸，談論台灣前途的動機。在畢業前一天，他在新公園（二二八和平公園）博物館前，向女友謝蓮治說明要去日本從事台獨運動的想法，女友並未反對。服完兵役之後，1958 年 6 月與謝蓮治結婚，12 月就一起到日本留學，不久即加入台獨運動，黃夫人也無怨無悔，一輩子支持他作台獨運動。

在政權變動的年代，總是外來統治者決定台灣的歸屬，台灣人的處境堪稱無奈又無助，只能任由宰割，縱使有反抗者如二二八，最終仍然無法改變台灣人的命運，只好默默接受被人屠殺的慘痛事實。生在這個時代的台灣青年，歷經政權變動的創痛，自然思考到台灣未來前途，以及台灣人該如何作為的問題。因此建立自己的國家，擺脫中國的束縛和國民黨政權的統治，成為台灣人的追求。黃昭堂就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成長，而走向建國之路。

二、台灣獨立運動的開拓者

二二八大屠殺之後，廖文毅在中國上海組成「台灣再解放聯盟」，後到香港，提出「聯合國託管，台灣人公投決定前途」的呼籲，並向聯合國提出請願書。1950 年結合在日本的台獨派人士，成立「台灣民主獨立黨」，正式對外宣



告台灣獨立建國的主張。1956年組織「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」，在海外形成一股勢力，影響海外留學生，打擊國民黨政權統治的威信。因此國民黨派線民潛入組織，進行分化與打擊的任務，並派人遊說、瓦解臨時政府的陣營。黃昭堂去日本時，正逢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內部分立與成立統一戰線，吸收留學生，組織再造的時期。

黃昭堂到日本後，旋即與南一中的老師王育德聯絡，並立刻面對要加入臨時政府或獨自成軍的考慮。後來決定另行成立組織，所以在1960年2月，王育德、蔡季霖、黃永純、傅金泉、廖春榮和黃昭堂等六人成立「台灣青年社」，並發行機關刊物《台灣青年》。這六個人是「台灣青年社」創始會員，也是台灣留學生新世代接續台灣獨立運動的開端，雖然追求獨立的目標與臨時政府一樣，但組織、運作與行動方式則大不相同。

這六位結盟出發的人士，有的已去世如王育德（1985年）；有的中途脫離之後再復出；有的離開之後就不再回來。其中只有黃昭堂一人自始至終都在台獨陣營裡，從沒有退縮過，永遠都站在第一線，往前邁進，不愧是台灣獨立聯盟的核心人物與重要領導者。

三、台灣獨立運動的守護者

1960年「台灣青年社」成立之後，留學生受到感動，加入青年社的盟員陸續增加，如許世楷、王義郎、王天德、周英明、金美齡、蘇仁泰、方仁惠、戴天昭、侯榮邦、林啓旭、柳文卿、張國興、張榮魁等人。人員增加，組織隨即擴充，1963年「台灣青年社」改為「台灣青年會」，黃昭堂出任委員長。

因《台灣青年》發刊之後，對留學生的影響日益擴散，加入的留學生數量也日益增多，國民黨政府駐日本大使館及情治單位乃收買盟員，進行蒐集情資的工作。1964年的陳純真事件就在這種背景下產生。陳純真將中央委員當選名單洩漏給國民黨，國民黨將此消息發送出去。青年會成員經內部檢討之後，知道是陳純真所為，乃逼問陳純真。陳純真雖然說出原委，但在逼問過程中，因



誤傷陳純真，造成許世楷、廖春榮、戴天昭、柳文卿、王南雄、宗像隆幸和黃昭堂等七人被起訴。黃昭堂被拘留 27 日。被判有期徒刑 1 年，但緩刑 3 年。

1966 年 7 月美國國務卿 Dean Rusk 來日本參加美日會談時，黃昭堂與侯榮邦、林啓旭、廖春榮、戴天昭、許世楷、張榮魁、宗像隆幸等八人在京都國際會館前舉行絕食，抗議美國支持獨裁者蔣政權。這是他第一次絕食。

陳純真事件之後，國民黨乃改變策略，進而與日本會商，要求日方遣送獨盟人士返台。1967 年張榮魁、林啓旭兩人到日本入國管理局（簡稱入管局）申請居留時，被入管局扣留，聯盟得知消息後，一方面聘請律師，要求東京地方法院「中止收容」；一方面聯絡張榮魁、林啓旭在獄中絕食，獄外則由盟員侯榮邦、吳進義、戴天昭、傅金泉、王天德、戴宏達、郭嘉熙、劉維彬、高嘉弘及黃昭堂等進行絕食，這是他第二次絕食。第三次是回到台灣之後，1999 年在立法院前絕食，要求公投立法。

1968 年 3 月，柳文卿到日本入管局申請居留時，突然被收押，並決定隔日早上遣送返台。因事出突然，被拘留時又已是下班時間，隔日又選擇尚未上班前遣送，入管局的細膩狡詐作法使得聯盟無法進行法律訴訟，也無法事前準備。因此在救援心切之下，盟員決定翌日早晨到羽田機場搶救柳文卿。黃昭堂、侯榮邦、林啓旭、戴天昭、郭嘉熙、張國興、吳進義、高齊榮、傅金泉、宗像隆幸等十人，跳入停機坪，欲以肉搏方式搶回柳文卿。在眾多警察圍堵驅離之下，他們十人當然無法抵擋得住訓練有素的警察，柳文卿終於被送走，而搶救的盟員也因「妨害公務、妨害營業、妨害航空法」而被起訴。黃昭堂再次被扣押，進入拘留所，也在獄中時寄出博士論文，終獲無罪釋放。

除守護盟員外，黃昭堂在日本期間，對台灣獨立聯盟扮演推手的角色，參與示威遊行，救援台灣政治受難者，幫助島內人士如彭明敏脫離台灣，向支持者募款，與日本政界、文化界、媒體友人往來，遊說其支持台灣獨立，更與來日訪問的台灣人士見面，討論台灣局勢。他在委員長任內，擔任緩衝協調和領導的角色，沒有擔任委員長時，仍然一樣也負起對內對外的的工作。他的存在就像一顆磁鐵一樣，容納箍住盟員的向心力，並結合外在力量，守護著聯盟的理念與追求。



四、台灣民族主義的論述者

黃昭堂初到日本時，與王育德等同志之間常討論台灣問題，也因意見不同而起爭議，為深入了解台灣而投入台灣史與台灣國際地位的研究。

他撰寫《台灣民主國の研究》是在探討台灣民主國的本質，是否就是台灣獨立建國。經由研究之後，他認為台灣民主國不是台灣民眾組成的國家，既不民主，也無現代國家之實，只是清國官員與台灣仕紳為了不願割台而做出的權宜之計，自然無法阻擋日本帝國領有台灣。他這種觀點有糾正廖文毅「台灣民主國」是史上第二次獨立建國的說法，但其目的並非是針對廖文毅說法而來，而是要探討台灣人獨立建國的源起與發展。他認為二二八是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的源頭，經過二二八大屠殺洗禮之後，台灣人覺悟到非當家做主，建立自己的國家，無法改變被強國侵略、欺侮的命運。這應是 1965 年以後台灣青年會及後來的台灣青年獨立聯盟、世界台灣獨立聯盟，於每年二二八，隆重舉行街頭遊行或室內紀念會的原因。

除此之外，黃昭堂強調台灣民族主義（nationalism）的重要性。1974 年，他首次到美國訪問，接觸到留美的台灣學生，而修正早先台灣人的觀點，認為凡是認同台灣，以台灣做為祖國的，都是台灣人。台灣民族主義的台灣人成分的擴充，以及認同的界定，使得台灣民族主義有新的內涵，新的時代意義。因此他特別將「nationalism」稱為「那想那利斯文」，還開玩笑說：「用台語念就是『那想』（越想）『那利』（越有理）『斯文』（人也會越斯文）」。

依據 1951 年舊金山和約的規定，日本放棄台灣、澎湖，但沒規定放棄給誰，因此台灣地位未定，應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前途。又因統治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一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之間，存在著「一個中國」、「誰代表中國」的問題，使得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常受這兩個政權的誤導與欺瞞。尤其自 1971 年蔣介石代表被聯合國趕出之後，不只國民黨政府自己呈現危機，更帶給台灣無窮禍害。這些問題都在中華民國與他國斷交、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他國建交時呈現出來。因此，黃昭堂與彭明敏撰寫《台灣の法的地位》，探討世界各



國對台灣地位的看法，以此說明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國家，除極少數幾個國家之外，都未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。這個實質研究有助國人認識台灣在國際地位上的處境，以及國共兩黨欺騙台灣人的事實。

黃昭堂對廖文毅、史明、王育德等人的台灣民族主義論，都提出他個人的主張和見解，其中有相同之處，亦有相異之處。他自認為是個「那想那利斯文之徒」。曾說希望死後，在墓碑上刻上「台灣那想那利斯文之徒 黃昭堂」。他深知台灣民族主義是台灣人意識的結合和呈現，也是凝聚人心，激發建國熱情的動力。

五、內外折衝的人格者

以個人之力參與運動，只要有勇氣、熱情和決心，即可完成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的壯志。但要聚集眾人、群策群力，共同建立事業，則不是一件簡單的事。尤其是獨立建國這種大事業，內有同志整合的問題，外有獨裁者的迫害，更是艱難萬倍。

台灣獨立聯盟爲了對抗獨裁政權，採取秘密組織的方式，以防國民黨特務的滲透破壞，竊取情資。組織要嚴密，同志之間必需要有相當的信任，領導者更要以身作則，有同志愛，又能守住秘密獲同志的信任，如此組織才能持續發展壯大。

黃昭堂就是具備這樣人格特質的人物。常常聽人說話，但自己話語不多；接觸層面多，但不傳話，也不漏口風；心懷同志愛，常照顧盟員與朋友，但不居功，不要人回報；理解人際關係的複雜多變，卻常以幽默話語化解尷尬，減少不必要的摩擦。他這種人格特質愈經歷時間的檢驗，愈獲得同志的愛戴與信任，因此成爲日本台獨聯盟長青樹、象徵性的人物。

他的人格特質與對理念的堅持不只凝聚了內部盟員對組織的向心力，更獲得外界的信任，所以長期能獲得台僑的捐款支助，日本政界、文化界、學術界的支持，使得台灣人獨立建國的主張，能夠繼續發聲。



1960 年代中期之後，台灣學生到美國留學的人數越來越多，已成為海外台獨運動的大本營。當 1970 年美國、加拿大、日本、歐洲、台灣等獨立組織欲組成世界台灣獨立聯盟（WUFI）時，黃昭堂認為 WUFI 應該設在美國，由美國本部負責。因為美國是影響台灣最重要的國家，也是舉足輕重的世界強權，留美台灣學生從事台獨運動者又多，是今後發展的重要據點。觀諸台獨運動日後發展，證明了他的見解正確、深遠。

他對台灣國內局勢發展，不只關注分析，更與島內民主鬥士來往，相互支援推動台灣政治的變革。1992 年他回到台灣之後，以他平易近人、親切幽默、溫馨寬厚的態度，廣結社會各階層人士。他的人氣旺盛，甚至李登輝也視他為少數的知交。他常說「成功不必在我」，當然台灣要建國不能只靠台獨聯盟的力量，但身為台獨聯盟的領導者卻能說出這種話，足見他心胸的廣闊，以及不居功的個性。

六、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典範

黃昭堂常常說「台獨是我唯一的專業」。

一個人要選擇任何行業都有可能，唯獨台獨這一行業，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可以選擇，縱使有機會也不是每個人願意選擇。因為在戒嚴的年代，選擇推翻中華民國政府，打倒蔣介石獨裁政權，建立台灣國做為自己的事業，不只會惹禍上身，禍及家人朋友，甚至會被逮捕而有生命的危險。但他到日本留學後，不久即創立「台灣青年社」，從此沒有離開過台獨陣營，終其一生都在為台灣建國而努力。因此他以台獨專業自許，實在是名至實歸，充滿著驕傲與光榮感。

以台獨做為專業，對現實生活不僅沒有幫助，有時還會面臨斷炊的苦境。黃昭堂因陳純真事件被拘留，和律師見面時第一句話竟是：「家裡沒錢買米，請先向聯盟朋友調錢為我照顧妻兒。」他也說過為了減少開銷，常常是一個參加台灣人的聚會，牽手只能待在家裡。居留日本三十四年期間，他未曾置產，縱使在 1976 年任教昭和大學，生活改善之後，仍然租房子度日，將薪水收入



用於台獨活動。雖然過這樣的生活，黃夫人都沒有怨言，還繼續支持他走下去。

1962 年黃昭堂被吊銷中華民國護照之後，他不曾申請過日本國籍，都以無國籍、特別居留方式在日本居留，而且被禁止出國，直到 1972 年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之後，才解除禁令。

黃昭堂就是這樣渡過在日本的三十四年，但他不曾有過怨言，還說從事台獨運動是種幸福，除此以外別無所求，這是他對待生命的浪漫方式。

世人常說：「創業不易，守成更難」，對黃昭堂而言，他在獨裁統治的年代，憑著理想與熱情，義無反顧投入台獨運動，創立「台灣青年社」，繼廖文毅之後，撐起台灣人建國的旗幟、勇往直前。一生不畏強權、不怕恐嚇、不顧詆毀，不曾背離台灣建國的理想，只要有助於台獨運動的發展，他都可以接納包容。如此胸襟與氣度感動了無數的人投入台灣建國運動，使台灣國家意識逐漸擴散壯大，成為建國的動力。

台灣獨立建國是黃昭堂一生的追求，也是他生命的寫照。他的理想、堅持與行動是台灣人的典範，他一生的經歷將是台灣人共同的資產，將繼續激勵台灣人的豪情與壯志、建立自己的國家。

- 參考書目：**
- 一、張炎憲，陳美蓉，《建國舵手黃昭堂》，台北：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，2012
 - 二、昭堂著，廖為智譯，《台灣民主國之研究》，台北：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，1993
 - 三、黃昭堂著，黃英哲譯，《台灣總督府》，台北：前衛，新修訂版，1994
 - 四、彭明敏、黃昭堂著，蔡秋雄譯，《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》，台北：玉山社，1995
 - 五、黃昭堂著，《台灣淪陷論文集》，台北：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，1996
 - 六、黃昭堂著，《黃昭堂獨立論集》，台北：前衛，1998



- 七、黃昭堂著，《台灣那想那利思文》，台北：前衛，1998
- 八、黃昭堂著，侯榮邦譯，《台灣新生國家理論》，台北：現代文化基金會，2003
- 九、黃昭堂著，侯榮邦譯，《確立台灣的國家主權－由事實上的國家到法理上的國家》，台北：現代文化基金會，2008